

《花灯调》(书摘)

□刘庆邦

春三月,山沟里的杏花开了,山顶还是寒凝冰封。那些杏树不是人种,都是鸟种;不是家生,都是野生。春来开花,不是谁让它们开的,它们自己觉得可以开,就自然地开了。它们开花,也不是为了给哪个看,不管有没有人看,它们只管开,白天开了,夜里接着开。淡淡的花香在山间弥漫,苦吟吟的,甜丝丝的。正是这样的杏花,让人一见,就喜得发惊。山顶的竹子在冬天也不落叶,似乎一直在带叶修行。虽说竹子的叶子一年四季都是绿的,可在冬天和春天有所不同。冬天的竹叶是燥色,一点儿都不明亮。到了春天,地气上升,春风一吹,叶片才一点一点变得明亮起来。竹子的叶子不是新发,不像别的树木那样落去旧叶换新叶,它们发的是内功,内部的血脉流动,就可以让原有的叶子焕然一新。此时,竹笋还在地下鼓动,没有钻出地面,竹梢上还留有一些未化尽的残雪。竹子得到春的消息,仿佛已等不及春风的吹拂,它们自己弹起竹梢,把上面的残雪弹落,任破碎的雪块儿纷纷落在竹林根部的地上。一群麻雀飞进了一片竹林,它们嘴尖舌快,噘嘴喳喳,在争相发言。它们像是就某一个问题发起了争论,互不相让,争得面红耳赤。又像是并没有预设的讨论主题,自说自话而已。不知它们遇到了什么新的情况,大家一哄从树林里飞走了,集体飞向另外的地方。

据历史记载,十万年前,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,海里只有波浪和鱼龙。后来由于地壳运动的起伏、颠覆和切割,海水退去了,这里变成了十万大山。海水没有了,但天上下雨地上流,水还是有的,只是水的形态变成了河流和湖泊。别看水是软的,山是硬的,天长了,日久久了,水流就可以改变山岩,使有的山变高,有的山变低;在有的山上开了门,有的山上开了窗。河山相连,山水相依。水可以改变山,同时也可以塑造山。这儿的山里有一个溶洞,洞顶有一滴水珠,水珠以亘古不变的均匀速度,日复一日、月复一月、年复一年地向下滴落,几万年下来,竟在洞底的地上形成一座拔地而起、体高数尺的石塔。有道是水滴石穿,这里正相反,是水滴石长。因水里含有碳酸钙,久而久之,碳酸钙积累下来,就长成了琉璃宝塔样的钟乳石。看到这样的奇特地貌,在不可思议之余,人们往往会想到鬼,想到神,说是鬼斧神工。其实这跟鬼神一点关系都没有,都是自然的造化、时间的作用,自然就是鬼神,时间就是鬼神。

这天一大早,向家明从市里乘车,往一个叫高远村的山村赶。车是向家明所在单位的一辆公用越野车,车的一侧书有红色的“人民检察院”字样,车顶安有警灯。这是检察院的领导特意给向家明派的一辆专车。向家明的职务只是检察院的一个科长,按说下乡时她还没资格坐专车。

火车一直一直往前,载着过路的云彩与星海,载着日与夜的白与黑。

一里又一里的铁轨延伸着,在如春雷般的轰隆隆里,在驶出车站的鸣笛声中,刚刚入职还不到一周的汪新,像那蒸汽机车开动时咕嘟嘟散发的浓烟似的,热血沸腾,激情澎湃。

1978年的这个春日,唤醒的何止是春泥化开后的残雪,还有汪新的童年梦想。立志做一名人民警察,是汪新这些年持续不断的动力。现在梦想得以实现,他拥有了自己想象中的样子。

小时候,汪新调皮捣蛋,长得却可人疼。他像母亲,皮肤白皙,大大的眼睛闪着光。若不是汪新太过顽劣,母亲打心底里是想把他当女孩子养着的。即使这样,汪妈妈还是会喊他“小白月亮”,这是属于母亲的称呼。

母亲去世后,汪新与父亲相依为命,可能是跟谁久了外貌就随了谁的缘故,汪新的样貌越来越像父亲。当警察需要磨砺,一路摸爬滚打下来,汪新的皮肤黑了不少,五官棱角分明,多了几分不符合年纪的凌厉,只有那双眼睛,清新如月。

平时,汪新不苟言笑,面对普通群众和大院邻里时,他的热心与亲和力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。

想母亲的时候,汪新就会对着镜子照照,再瞧瞧小时候与母亲的合影,依稀还能听见母亲呼唤“小白月亮”,记忆仿佛就在昨天。

如今,汪新和他的同事一样,撞入人海,在南来北往的路上,投身于汹涌的人潮。

东北味儿的春天,乍暖还寒。

车厢里拥挤不堪,严重超员,车座上坐满了人,车座下、车座靠背上、行李架上躺满了人,过道站满了人,大家挤得像沙丁鱼罐头……

乘客有睡觉的,有聊天的,有看报看书的,有嗑瓜子的,有下象棋的,有织毛衣的,有纳鞋垫的,还有喂兔子喂鸡的……

汪新伴随着嘈杂的声音巡视车厢,听着车厢广播员正气凛然地说:“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,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,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,使之上升为理论,并用来指导实践。正是因为这样,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……”

年轻的乘务员蔡小年一边拎着水壶给乘客添水,一边不停地吆喝着:“南来的、北往的、佳木斯的、鹤岗的、棉纺的、工厂的、马上接班上岗的,下乡的、插队的、回城没找到单位的、宾缝的、犯法的、成天投机倒把的……”

乘客的喧哗声、孩子的哭闹声以及鸡叫声满满当地搅和在了一起。汪新深吸一口气,感到整个人都被挤扁了,真是寸步难行。车厢拥挤不堪,几乎找不到下脚的地方,想得到想不到的地方,都塞满了人。

领导之所以破例安排一辆送她去高远村,一是对她下一步的工作抱有期望,二是去高远村山高路远,山路崎岖崎岖,去一趟不容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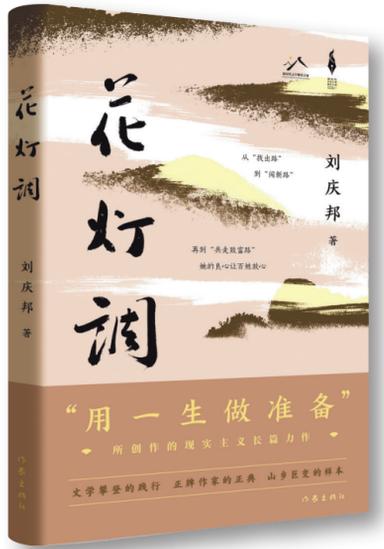
一年前的2015年春天,向家明正在检察员和公诉人的位置上干得好好的,被临时抓差补缺,派到一个贫困村当驻村第一书记。她没有辜负领导和大家的期望,一进村就开足马力,干得马不停蹄。她充分利用自己在市里工作的资源优势,很快把上上下下的脱贫攻坚积极性都调动起来。在上级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协助下,经过全村村民的艰苦奋斗,用了不到一年时间,全村的人均收入就达到了国家规定的脱贫标准,摘掉了贫困村帽子。当年年底,向家明被评为市里的优秀共产党员和脱贫攻坚先进个人。既然完成了驻村帮助脱贫的使命,按照市里关于驻村轮岗的规定,向家明可以理所当然地回到检察院,穿上板正的检察制服,继续做庄严的检察工作,并可以天天回家,过方便而优越的城市生活。然而就在这时,高远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因事回城去了,急需另派一个人接替第一书记的工作。检察院的领导考虑到向家明在驻村工作中成绩优异,并积累了脱贫工作的经验,就征求她的意见,希望她能去高远村当第一书记。向家明说,既然党组织这么信任她,那她去吧。征求向家明意见的是检察院的党组书记,书记说:你驻村刚回来,院里本不该再派你去驻村。可院党组在全院党员中挑来挑去,还是觉得你去当第一书记最合适。我们这样做有些鞭打快牛,对你来说可能有些不公平。我的意见是,你不必马上答应,先去高远村看一看,回头咱们再商量。你要是在实在不愿意去,院里不会勉强你。书记提醒向家明说:高远村是咱们全省为数不多的深度贫困村之一,我去那个村看过。在去之前,我不大理解什么叫深度贫困,不知道深度是深到什么程度。去高远村探过才知道,那个村的贫困是谷底的贫困、探底的贫困,是贫困到不能再贫困。高远村脱贫攻坚的艰难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,向家明同志,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说到这里,书记见向家明面色有些凝重,微笑了一下,问:你不会被我的话吓着吧?

向家明说:不会的。我害怕老鼠,不害怕贫困。为向家明开车的是一位有着多年在山区驾驶经验的师傅。上车后,向家明问师傅以前去没去过高远村,师傅说去过。向家明问,从市里到高远村有多远,师傅说,直线距离大约60多公里。向家明乐观地说:不算太远,这个距离估计两个多钟头就跑到了。师傅摇头,说不行,保守估计也得跑四个多钟头。向家明问为什么,师傅说因为去高远村没有路。师傅的回答让向家明觉得有些可笑,她说:鱼在水中游,车在路上跑。没有水,鱼就不能游;没有路,车在哪里跑呢?师

傅解释说,他的意思是,高远村与山外不通公路,连简易的硬化路都没有,都是一些原始性的砂石路。在这样的路上,车像老牛爬坡一样,根本跑不起来。

进了山向家明就感受到了,师傅说得不错。砂石路坑坑洼洼,布满滑沙和坚硬的石子,车轮碾在上面,一弹一跳,像猴子玩杂技,一点儿都不踏实。山路弯弯曲曲,弯子多得数不胜数。人说羊肠子的弯弯多,这里的弯弯恐怕比羊肠子的弯弯还多。车子刚转过一个弯,以为该走一段直路了,不料又一个弯道马上出现在眼前。向家明听说过,这里是天无三日晴,地无三尺平。今日走在山道上,她有了新的体会,觉得应该在前两句评价的后面再加上一句,叫道无三尺直。路上弯道多,车子只能随着弯道拐来拐去,甩来甩去,向家明觉得自己的头都被甩晕了。山里海拔落差很大,低的地方有几百米,高的地方恐怕超过了两千米。车子跟着海拔的落差起起伏伏,山路“下海”,车子也得往“海里”扎;山路入云,车子也得使劲儿往高处拔。有一段路一路下坡,向家明眼看着车窗外有了农舍、炊烟、水塘、竹园和鸭子,以为车子总算开到了人间,离高远村应该不远了。可司机师傅却没有任何停车的意思,一踩油门,又向高处爬去。爬到又一个山顶,向家明偶尔往下一看,见刚才走过的路变成了一道时隐时现的灰线。山道还非常狭窄,对面走过来一头牛和一个拿着树枝放牛的人,车就得停下来,等牛和人走过去,车子才能继续往前开。如此逼仄的小道,还常常一侧是悬崖峭壁,一侧是万丈深渊,真乃处处危险,步步惊心。当一个农妇领着三只山羊并背着一篓青草走过来时,师傅又不得不把车子停了下来。趁车子停下来时,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向家明解开安全带对师傅说,她到后面的座位上去坐。在师傅开着车时,她见师傅的两只眼瞪得像铃铛一样,开车开得全神贯注,她一句话都不敢跟他说。车子停下来的工夫,她才提出到后面坐。坐在前面时,面对道道深渊,她老是心惊肉跳,担心车子会一头栽进深渊里去。坐在后排座,用师傅的驾驶座位挡住她的视线,虽说有掩耳盗铃之嫌,但恐惧总算减轻了一点点。

就这样,等越野车开到高远村的村委会门口时,五个多钟头过去了,已到了吃午饭的时间。还好,这天没有下雨,太阳在薄云中时隐时现。飘动的云彩,使投射在绿色山峦上的影子变得深一块,浅一块。接到镇里通知的老支书和年轻的村委会主任,早已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等候。老支书叫夏方东,村委会主任叫尚应金。他们得知,向家明在另一个村当过驻村第一书记,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,就帮助那个村实现了脱贫。他们还听说,这个女书记厉害得很,比当年的花



《花灯调》,刘庆邦著,作家出版社,2024年1月

木兰和穆桂英都厉害。女书记之所以要到高远村看一看,就是下一步有可能来任第一书记。镇领导对他们交代,要他们把态度准备好,对向书记的欢迎和招待要热情一些,争取给向书记留下一个好印象。谁都害怕贫穷,谁都喜欢脱贫,老支书和村主任也不例外。一听见汽车响,二人赶紧从屋里迎了出来。他们看见一个女的从车上下来,料定她就是他们要欢迎的向书记。见向书记的手又白又小,把自己的手搓了搓,只以笑脸表达欢迎,没敢跟她握手。村委会的办公室是一座三开间的两层木楼,木楼显得有些陈旧,廊柱和门板都黑得失去了本色。他们对向书记道了辛苦,请她到办公室里歇息。办公室的东间屋只有一盘煤火,火炉上盖着铁盖,看不见明火。从铁盖那里面往周边扩展,扩成了一张铁板圆桌,圆桌一角竖起一根茶杯般粗细的烟筒,煤烟子通过烟筒排到室外,屋里也闻不到煤烟子味儿。整个办公室里暖融融的,表明炉火里的煤火一直在燃烧着。圆桌上放着几杯早就煮好的茶,因连着煤火的铁板圆桌有保温功能,茶就不会凉。人在不会凉,人走了茶也不会凉。

既然到了吃午饭的时间,饭是必须吃的。老支书和村主任早有准备,煤火上温着一锅早就蒸好的白米饭,还有一锅白水炖老豆腐。老豆腐是当地的做法,豆腐还是豆花儿时,里面就放进一些切碎的青菜,压成豆腐块时,青菜与豆腐融为一体,看上去白里有绿,绿里有白。他们做豆腐时不过油,连盐都不放,就那么用白水一煮就行了,汁是原汁,味是原味。要招待向书记,没有肉可不行。村主任打电话在附近镇上的饭馆订了一份烧羊肉,托人骑摩托车把羊肉送到村委会。别看镇上离高远村只有十几里,因山间小路难

《南来北往》(书摘)

□高满堂 李洲

富伸长脖子往窗外看去,车外的树影蹭得慢了下来。

王国富的心火往外冒,一把攥住汪新的手,恳求道:“警察同志,你先别写了,火车马上要到站了,你赶紧把包给我找回来吧!”

汪新磨片刺,说道:“你跟我来。”

王国富忙拿起行李,跟着汪新朝前走去。汪新带着王国富,在乘客之间奋力挤着,不忘细致地观察周围乘客,寻找王国富那个黑色皮书包。他们好不容易挤到车厢连接处,碰到了蔡小年。蔡小年站在座位前,高声地喊:“我的包呢?我的包被偷了。”

汪新赶紧扒着车座靠背,挤到男人身前问:“同志,你先别着急,我是警察,你跟我说说具体情况。”

那男人一边比画一边语无伦次地说:“我打盹儿了,唉,就睡着了。一睁眼,抱在怀里的包就丢了!”

汪新听罢,环顾四周,说:“包是从你怀里丢的,也就是说,偷包的人就坐在你旁边,你还记得周围都坐过什么人吗?”

汪新一问,那男人更有点急了,连忙说:“我哪能记得?我上车就睡了,这车一会儿一到站,不知道都换多少人了。”

汪新望向周围乘客,问道:“大家有人看见谁偷了他的包吗?”

旁边的人们都忙不迭地摇头。汪新问不出什么,便从工作包里拿出记事本和笔,询问男人做起笔录。“乘客王国富,男,丢失一只黑色皮书包,上面印着‘上海’字样,丢失时间不详。”

汪新见王国富急得气都喘不匀,关切地问:“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?”

“三个烧饼!”王国富回答道。他指着汪新的包,说尺寸大小差不多。王国富真是急了,汪新惊讶地看向他,感觉丢的东西不像三个烧饼这么简单。王国富见状连忙补充说:“还有半条人参烟、一包药材!”汪新低头唰唰地在本上记录着。

呜呜呜,火车的长鸣从车头悠悠传来,王国



《南来北往》,高满堂、李洲著,作家出版社,2024年2月

乘客前胸贴后背,每个人都看似一动不动,仿佛又在暗自使出吃奶的力气,才能保持自己的方寸之地。汪新恨不得把自己的身体缩成纸片,挤一挤总还是有缝隙,他艰难前行。

突然,汪新前面的人群骚动起来,一只鸡扑棱棱地飞了起来,拍打着鸡翅越过人群。乘客瞬间乱作一团,尽其所能,各显神通,纷纷举手跳着抓鸡,可是谁也抓不住。

鸡像是抖了起来,有种不可一世之感,嚣张地在人们头顶、肩头乱飞。

说时迟,那时快,只见一个警帽猛地扣在了鸡的头上。刚刚还高昂着头颅的鸡,像是被雷劈了似的,耷拉着脑袋被汪新提在了手里。

此时,警帽已经戴在了汪新头上。给鸡盖帽的速度一气呵成,快如闪电。被鸡扑棱过的乘客身上落了鸡毛,他们被汪新那双手惊得目瞪口呆,大家纷纷朝汪新看去,空气中像是还残留着他出手时一掠而过的劲风。

汪新穿着崭新的警服,胳膊夹着工作包,刚18岁的年纪,正是少年意气风发时。他的一双眉眼流光溢彩,那是青春的印记,是少年璀璨的绽放。也许是鸡也怕强人,它在汪新手里,老老实实的,听话得像假鸡。鸡主人讪讪地说:“嘿嘿,同志,这是俺的鸡,你可把它捉住了,谢谢你啊!”

汪新扫了鸡主人一眼,把鸡举起来,正色道:“自己的东西得看住了,不能弄得到处乱飞,这要是伤着人,怎么办?”

鸡主人陪着笑脸说:“实在不好意思,这回,

行,等烧羊肉送到村委会,至少需要一个多钟头。向家明说她不爱吃肉,不同意给她订羊肉,说午饭吃不吃都没关系。可老支书和村主任态度坚决,不容推辞。镇领导安排他们要把态度准备好,坚决让向书记吃到肉的态度,也是他们所准备的态度之一。老支书说:向书记,我们欢迎你到我们高远村当第一书记,第一顿饭光让你吃点素菜可不行,我们心里过意不去。

向家明说:我只是来高远村看看,是不是到这个村当第一书记,还不一定呢!

老支书和村主任互相看了一下,老支书说:到我们这里来一趟不容易,就算你是市里的上级领导,我们也要招待你一下,给你接风洗尘。我们还准备了一瓶当地烤的苞谷酒,等羊肉送来了,我们陪你喝一点。

向家明对酒精过敏,向来滴酒不沾,别说让她喝酒了,她一听带三点水的那个“酒”字,脸就不由得红了一下。她连连摆手说:不不不,我从来不喝酒。

司机师傅到屋里转了一下,端了一杯茶,到外头一棵树下抽烟去了。

向家明到门口招呼师傅说:你在屋里坐一会儿嘛。

师傅说:你不用管我,你们只管说你们的事儿吧。外面空气好,我在外面站一会儿。

火炉周围放有几把木椅子,向家明和老支书、村主任在椅子上坐下,老支书开始向她介绍高远村的基本情况。高远村共938户,4829人。建档立卡贫困户437户,2074人。截至2015年年底,年人均纯收入876元,月人均纯收入还不到80元,离国家所规定的脱贫标准差得很远很远。说到这里,老支书说,高远村偏僻贫穷,当年国民党的军队不敢走的地方,红军正好可以走。红军四渡赤水时,有一部分红军曾在高远村的树林里露宿住过一晚。红军还向一户姓杨的村民家借过五石苞谷,并打了借条。

向家明听得眼睛一亮,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。她说借条很有价值,很有意义,问:借条还在吗?

老支书说:杨家搬家时把借条弄丢了。

向家明说:借条是革命文物,可以证明老区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啊,丢失太可惜了,太可惜了!你跟杨家人说说,再让他们仔细找找嘛,要是找到了,咱们马上向市里汇报,可以送到市里的博物馆去展览。

他们正说话,忽听得头顶的楼板上呼呼啦啦一阵响。楼板比较薄,有的地方裂开了缝隙,上面的声音显得很清晰,似乎伸手可及。向家明仰脸往楼板上看了一下,顿时有些惊恐,问:楼上是不是有老鼠?

老支书和村主任都听到了老鼠在楼板上奔跑打闹的声音,也注意到了向家明惊恐的表情,他们你看我,我看看你,似乎都不敢承认屋里有老鼠。有头发就有虱子,有屋子就有老鼠,老鼠对他们来说是司空见惯,一点儿都不可怕。可是,向家明是城里下来的女干部,他们担心要是嘴不闭门,承认了屋里有老鼠,有可能会把她吓走。老支书像是想了一下,说:外面没有老鼠,咱们到外面去走走。

乘客带着他们的大小包裹,脚步匆匆。汪新提醒王国富,让他注意一下,警觉着点,哪怕是和他的包相像的,都别放过。

就在这时,汪新看到一个男乘客背着一个黑色皮书包,伸手一指问:“那个包,是你的吗?”王国富忙看去,失望地摇了摇头。

车站的警察也加入了搜寻,人群中有人多了几分慌张。汪新敏感地察觉到了一个男乘客有意闪避的动作,定睛一看,只见他背着一个黑色皮书包。那人步伐凌乱,汪新一下蹦到他的面前,速度之快,如离弦之箭。就在王国富还在纳闷之时,汪新已强行把那人的包翻过来,包上赫然印着“上海”字样。

王国富立刻反应过来,激动地喊着:“就是这个包,他偷了我的包!”

那人眼中闪过一丝慌张,随即镇定下来,装模作样地说:“谁偷你包了,你这人,怎么胡说八道?”

那人的小动作没有逃过汪新的眼睛,他面不改色地说:“同志,请你打开包,我要看一下。”“这是我的包,凭啥给你看?”“我是警察,有这个权力!你要是不想配合,那就跟我走一趟。”

那人一听汪新要带走他,顿时瘫了下来,唯唯诺诺地打开了包。

王国富探头看了眼清楚,那不是他的包。对于误判,汪新很是惭愧,诚恳地向那人道歉,心里忍不住感叹:“看来,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警察,要走的路,还有很远。”

那人腿肚子转筋,直到走出车站,心里仍不住嘀咕:“若不是犯过事儿,刚出来不久,哪能一看到警察就腿软,不听使唤。今后,得做个堂堂正正的人,才能站在光天化日之下不羞愧。”

王国富的包还没找到,他又嚷了起来,像催命似的催汪新。包找不回来,可真是要了他的命。汪新不停地站在出站口的乘客中搜寻,可惜王国富的那个包依旧难觅踪迹。

时间不等人,眼看着快要开车了,王国富绝望地望着汪新问:“同志,车要开了,我的包不是找不回了吗?”“我们先上车。”

对于王国富的问题,汪新无法回答。作为一名人民警察,他内心渴望的是,让群众的财物物归原主。面对王国富不停的询问,汪新无法给他答案,也无法给自己答案。汪新闭口不言,上了车,径直朝广播室走去。